

中国外语教育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记“第三届中国外语战略与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

谭业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1. 引言

“2014年外语高考改革论坛”^①之后,与会专家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有关高考改革的咨询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笔批示。为了进一步梳理和提炼中国外语教育改革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外国语》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再次合作,于2014年11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召开了“第三届中国外语战略与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

论坛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束定芳教授和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院长程晓堂教授主持。21位专家^②联系国际和国内实践,对关乎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澄清了有关概念和认识,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和对策。本文分几个方面汇总和概括各位专家的发言要点。

2. 哪些问题需要探讨?

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将学术界需要探讨的中国外语教育问题分为三类:1)如何评价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评价我国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育?2)如何应对最近几年引发争论的外语教育问题?比如:外语教育和母语教育;通用外语语种和非通用外语语种;英语和其他语种;英语专业四、六级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外语高考;“复合型”人才等;3)外语教育未来如何发展?新世纪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远景怎样?比如需要探讨国际化背景下外语教育的战略考虑,不同高校和不同地区外语教育的特殊性和多元化,外语教育和孔子学院的关系,等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教授指出,外语教育界需探讨的问题应涵盖幼儿外语教育、小学外语教学、中学外语教学(中考)、大学外语教学、专业外语教学等不同阶段;应包括外语规划、课程标准、教材、课堂教学、评估(测试)、教师发展等方面。

3. 如何探讨中国外语教育问题?

胡壮麟教授就如何思考和探讨中国外语教育的宏观和微观问题,提出了5项应秉持的原则:1)应引入跨学科、超学科的视角,扩大探讨中国外语教育改革问题的视野。外语教育涉及到语言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讨论时要有超科学和跨学科视角,在课程设置上要考虑与不同学科的关联和关系。2)应以国家语言政策为基准,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外语教育问题。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国家语言政策的一部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正规外语教育都是在政府部门领导下、在国家外语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从不同历史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到,探讨中国外语教育必须考虑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况。应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外语教育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外语能力影响到中国在国际

① 此次论坛即为《外国语》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于2014年6月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外语战略与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首届论坛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和《外国语》编辑部于2009年10月举办。

② 专家详细名单和发言顺序请参见 http://news.shisu.edu.cn/teachnres/2014/2014_teachnres_025272.shtml。

际上的话语权,如我国常驻联合国人员的数量与大国身份极不相称,影响到国家利益。3)坚持辩证分析,求同存异。在中国外语教育的有关问题上不少意见是相互对立的,而许多对立面可以互补和融合,如母语和外语的关系,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等。不能偏执一方,应求同存异。外语教育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社会各界各部门各群体,需要考虑他们的认识和态度。国家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学术界的意见需要交流互通,国家有关部门(如高教司和基础教育司)之间也需协调统一。4)避免概念模糊,坚持实事求是。在外语教育问题的探讨中,切忌教条和口号,需要实事求是,明确具体问题,然后提出具体的改进方案。在术语理解上可能不统一,如以前的“专业英语”和现在的“专业英语”不统一;讨论中应避免概念模糊,如英语是不是第二语言的问题。5)注重实践,深入调查,总结经验。比如对以往“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和以往的“一条龙”实验,需要开展调查,总结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经验。

此外,束定芳教授也强调,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应该解决实践问题,为教学实践服务;课程标准制定、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和评估等都应该在充分的理论研讨和实践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应该互相呼应、衔接和促进。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指出,中国外语教育的问题,有大小之分,有的是涉及国家顶层设计的问题,有的是微观的问题,需分开考虑,也应有先后。

中国海洋大学杨连瑞教授主张应该用系统发展眼光思考外语教育问题,科学规划教育发展战略,将外语教育看作一个系统,实施全方位全程教育规划,使各部分目标服从大系统的最优目标,改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4. 中国外语教育突出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4.1 基础外语教育和大学外语教育的衔接问题:“一条龙”的规划与实施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琳教授表示,在我国外语教育面临诸多难题中,大、中、小学不同阶段教学内容缺乏衔接,相互脱节与不合理的重复并存,这是多年来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症结所在[1]。他指出,要改变“群龙无首”的状态,就要以某种方式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负责制定和实施外语战略规划机构,对有关中国外语教育的研究和政策措施进行统筹安排和落实,促进与外语战略规划有关的国家行政部门如国防部、外文局、中央联络部等与外语学术界的交流。

南京大学杨治中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刘道义编审等指出,要实现“一条龙”,就要改变目前大、中、小学英语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缺乏沟通的现象。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指出,目前的外语教育缺乏整体规划,过于急功近利,顾此失彼,事倍功半,急需改变。

陈琳教授对外语教育界的“一条龙”概念进行了历史回顾,并指出“一条龙”需贯彻到外语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指导思想、外语教学法、测评、师资培训等方面。在一条龙的指导思想下需要明确各阶段的定位和目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龚亚夫研究员认为,“一条龙”模式的实施,必须明确小学英语课开设的关键问题,关键在接触的频度(exposure),而不在于开设的年限或早晚,不搞一刀切,如果开设,就需保证最低频度。

刘道义编审主张外语教育的多级性,多选择性,应考虑多模式(公办、民办、国际班合作班、特色学校),一条龙可以长短不一,要群龙起舞。

王文斌教授认为,中小学教师和大学老师是处于横轴线上的不同的点,有先后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前面走不好,就会影响后面。

胡壮麟教授就“龙头龙尾”孰轻孰重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条龙的关键在中学,应主要抓好中学外语教学改革。

4.2 有关外语教育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的问题

4.2.1 对外语教育价值和理念的认识误区与纠正

龚亚夫认为,社会舆论对中小学英语教育的“围攻”,地方教育部门的“倒英运动”,造成了思想的混乱,虽然反对之声随着国务院考试改革政策的出台而趋于平息,但是英语教育界没有认真回应社会舆论提出的质疑,也没有从理论上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错误观念仍然影响着地方行政官员的决策,必须对于英语教育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英语教育的价值,工具性只是其中之一,掌握一种通用的外语是21世纪公民必备

的技能之一。外语教育有益于人的大脑与心智发展(包括思维能力、包容性与国际视野),有益于个人学业和事业成功,有益于国家软实力提高和国际交往,有益于国民文化素养提高。

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指出,在中国,英语不是工作语言,英语教育在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中,在各种矛盾观念中发展。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认为,对英语教育三十年冷热情绪的摇摆,与社会历史情境息息相关,集中反映了国人在认识母语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时的矛盾和纠结。母语和外语文化关系的处理可能是外语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她主张放下忽冷忽热的“疯狂”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用开放性、对话性和创造性的心态对待外语与母语教育,达到 $1+1>2$ 的“生产性”效果。在理念上,不把两种文化当作是对立矛盾的,而是把两者看成是相得益彰的、和谐的。在评价话语上应避免过激。

山东大学王俊菊教授认为,应该主动走出去,通过媒体、专家讲座、系列普及文章等方式宣传、理清和纠正社会各界对外语教育的错误认识。

4.2.2 外语教育的内涵目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对立统一

龚亚夫认为,需要转变英语教育理念,从培养人的角度设计英语教育。功能—结构课程设计思路是工具性的,未涉及对学生核心素养、良好习惯与人格的培养。以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为核心的教学,其实远远不够,并不涉及人的培养,尤其是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与思辨等高阶思维能力,与国家立德树人的宏观培养目标不匹配。应从全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个人学习的动机所属的范畴,要改变学生的心智和生活,注重情感、语言和认知的互动和人格的塑造,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品格和情感。应调整英语教育目标,设计关乎语言、社会文化和思维认知的多元目标。

徐锦芬教授通过学生学习状态和动机的跟踪调查指出,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必对立,学生的认识慢慢会实现从工具性向人文性的自然转化。

4.2.3 外语教育水平目标的设定:多层次和多样化

刘道义编审指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外语教育不可能均衡发展,决定了我国的外语教育有其特殊性。义务教育人人可以享受,但是达到的外语水平有区别,有分化,教学目标的设定要有高有低有个性,教育公平不是齐步走,应区分层次,讲求实效,保证质量。

王守仁教授认为,外语教育的目标应该多样化,语种更加多样化,各阶段合理分工。促使英语水平不断提高的根本动因是使用,与需求、环境和机会有关,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在设定目标时应该“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点面结合”。少部分国际化人才,需继续提高达到欧洲参考框架水平。应注重高端英语人才的培养,加大力度培养各个学科通晓国际事务、具有国际视野、参与国际竞争、制定国际规则的人才,尤其是国际化人文社科学者。“面”就是普及目标,不能太高,提倡以母语为基础发展多语能力,具备外语素养,但大学英语教学不做硬性要求,避免夸大英语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会涉及主权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宝成教授也认为,课程目标和专业目标设定要宽,要多层次,先让一部分人高起来,避免天花板效应。

杨治中教授提出,应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教学要求制订要适当。例如,要求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能力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大学英语教学课时有限,主要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主要还是帮助学生夯实语言基础,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有更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继续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

4.2.4 面向社会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一元到多元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基于调查数据指出,留学生数量增加和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人数的增加,改变了人才的构成,为国内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国家发展战略,如“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对外语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从招生状况的调查数据看,我国有关语种的人才紧缺。人才培养要为学生就业服务、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而不是为人为制定的学科服务。

文教授基于西点军校外语专业的培养体系及其语言文化和区域研究课程设置的分析,主张我国的外语专业应构建多元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传统语言—文学、复语、外语+区域研究、外语+辅修等不同的培养模式;在外语专业教学中加强汉语能力的培养;提高中外国情的比较能力,以此发挥国内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优势。

韩宝成教授认为,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内容涉及文史哲社科各个主题,应以主题带动技能发展,明确外语专业的内涵,即明确专什么行,专什么业。

高一虹教授强调,应突出外语人才培养的特色。常俊跃教授指出,目前的状况是千校一面,专业人才缺乏特色,须思考统一大纲是否有利于英语专业教学出特色,994所院校能不能采用不同的专业教学模式。

四川大学石坚教授认为,应树立人才培养的多元观,适合多元的需求,既有服务本土区域的应用型人才,也应有理论基础扎实的学术型人才。大学的定位应该转型,人才培养结构也需做出调整,高职教育是个薄弱环节,但是也是关键。

王文斌教授主张实施人才培养分类计划,针对国家层面战略安全发展需要,针对地方各部门、民间各层次的需要,针对提升国民素质和基本交流的需要,明确不同的培养实体和目标,明确不同高校的具体目标和培养人才的类型。教学大纲也要分类,不能用一套大纲或人才培养方案一统天下。

4.3 有关外语教学的理论、内容和方法的问题

4.3.1 国内外教学理论和方法的融合问题

杨治中和王文斌教授认为,应慎重对待国外的各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不生搬硬套,不盲目跟风攀比。应注意提炼和整理经实践检验的、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学生实际水平和中国人学习外语特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法。教与学的成效是衡量理论和方法的最终标准,国人不必妄自菲薄,不能扼杀自己的创新能力,应注意博采众长,扬长避短。

4.3.2 有关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问题

(1) 外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高一虹教授指出,应由侧重功能-结构大纲转向文化认同大纲,在孔子学院和一般学校的英语教学中,都需完善中国文化的表述内容和方式,可借鉴同类型国家的经验,也可输出本国经验。 $1+1>2$ ，“中西贯通”可算是外语人才培养的一个特色。教学中应融入符合学生主体认知特点的文化内容,并在不同阶段做出相应变化。韩宝成教授借用许国璋先生和周有光先生的一些经典话语,探讨了课程和专业目标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区别,提倡“教怎样做人”,“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许国璋语),语言应该当文化来教而不仅仅是当技能来教。着眼于国家文化传播的宏观目标,通过外语教育使我们的软实力“硬”起来,讲好中国故事。

龚亚夫先生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该重构跨文化交际的理念,不要刻意区分英语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要认识到文化的流动性、变化性、交融性。

石坚教授也认为,课程设计上不仅看工具性、功能性,应该重视其内容的文化和思想价值,对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

(2) 外语教材的问题

陈琳教授指出,需要借鉴汉语教学中教“真语文”的研究,思考教“真英语”的问题。

龚亚夫研究员主张中小学教育需要跳出英本主义(native-speakerism)的思维框架,英本主义理念下的真实性、真实语境与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实际相距甚远,学生用最多的时间学了很多不出国用不上的英语,很多学习内容远离学生的内心世界与认知体系。他还举例说,在当前的教材中存在虚假、无用的废话,不合理的情景设置,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和发展。

石坚教授提议研究者对比英语动画片“Peppa Pig”(《粉红猪小妹》)和国内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所使用的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反思小学英语教材的编写。

陈琳教授指出,目前英语教材的多样化是好事,但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不合格乱象,需要面对。王文斌和杨连瑞教授倡议负责任地编写教材,整治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教材编写乱象,建立有效的教材评估机制。

4.3.3 教学方法问题

王初明教授认为,语言学习是多因素影响的过程,受到情感、社会文化、认知和语用等因素的制约,是通过长期、大量接触学会的,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找到适合中国人的外语学习方法。

石坚教授建议,教育方法要与时俱进,针对年轻一代手机阅读的新习惯,研究“90后”学生“指尖上”的学

习方法。应用多媒体,开发适合中国学生主体特点“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外语教学课程体系。

广东外语职业技术学院曾用强教授介绍了他所在学校的改革经验,主张以“教学资源库+备课平台+生态环境”的新常态取代“一本教材,一套课件,一次考试”的外语教学老常态。他指出,学生兴趣和需求的变化速度远大于老师教学思想的变革速度,“课本+课时”的教学模式使老师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老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增强老师改革创新的动力,提出新的教学理念:1)教师的职责是让学习发生,创造动机,满足需求;2)老师与学生同成长,建立老师与辅导员会诊制度;3)教学改革从课时革命开始,学习环境倒逼教学改革,科学运用信息技术,利用和引导慕课(MOOCs)等新的教学方法。

杨治中教授和徐锦芬教授认为,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电子资源、国家提供的语言获得通道,使学生有充分的语言沉浸。

4.4 外语师资现状、培训和发展问题

束定芳教授指出,大力提升师资质量是推进外语教育提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外语界应为外语教师发展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推动有关部门为教师发展创造必要的保障条件。外语教师的提升主要在语言能力(综合能力)和教学创新能力方面。

杨治中教授指出,我国有一支极其庞大的英语教师队伍,英语语言水平和教学能力参差不齐,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语言水平普遍有待提高,培训时应给予更多注意。英语教师在获取高学历的过程中过于偏重学习理论和提高科研能力,对教学能力的提高有所忽视,教学与科研应更紧密结合。不应过于注重“学生评教”,教师的主导作用是计算机和其他教育技术无法替代的。

徐锦芬教授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问题根源在课堂教学质量,课堂有限时间内的成效有待提高,教师须加强培训。她还指出,优秀小学英语师资不足,存在教学方法滞后,“扼杀兴趣”的现象,应特别重视师范生的岗前培训,弘扬教师求知精神,发展创新能力。

王初明教授指出,师资培训中,不要过多注重宏观问题,不仅要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更要着重针对中国教师的情况和中国课堂教学的具体问题,如英语水平在高中阶段的两极分化问题,单词语法死记硬背等实际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通俗易懂的有关理论(比如“学相伴,用相随”理论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王文斌教授也认为,教师培训中,比如国培课,不能只顾形而上,还要兼顾形而下,中小学教师的培训重点应在解决实际问题,如如何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提升其积极性。

王守仁教授强调,应当尊重老师,不要伤害老师的感情,不断改善教师发展空间,帮助教师转变教育理念,充分考虑其特点和生存状态。

4.5 外语教学评估、测试及其反拨作用问题

杨治中教授认为,应抵制应试教学,不以做模拟试题代替正常教学,改治标为治本,帮助学生学到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而不是以过关为目的的应试能力。

王初明教授指出,考试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应试教育的观念问题。对于应试,应该辩证地看待其危害性和积极性。在目前情况下无法阻拦“应试”,就可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如“逼入学、指挥学、促学”等,在考试改革中通过弘扬正面积积极的教育理念,调整阅读和写作命题要求,发挥学生在语言使用中的创造性,释放其潜力,淡化抵消“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负面作用。利用好考试的超强的反拨作用,提高其信度。重点加强评分员的培训,建立评分员监测制度。

龚亚夫先生指出,英语评价和测试改革关键不在次数、字数、分值,也不在于是否考口语或者听力,而在考试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目前学校测试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命题过程和技术还相距甚远。需要更新地方各级行政职能部门领导的认识,对各地各级参与命题人员进行培训,也需要认识国外测试方法、欧化测试标准用于评估我国中小学英语学习的局限性。

王俊菊教授指出,存在教学大纲设置的指导目标和检测不呼应、不协调甚至矛盾的状况,多维度的外语能力如何考核的问题亟待解决。韩宝成教授认为,对考试来说,价值取向是什么就考什么,考试的内容应该能够涉及语言所在的社会群体文化。刘道义编审提议,中学成绩的评估不要以时间为界限,而应以学分为标准进行考核。

杨连瑞教授特别强调,目前社会上英语考试名目繁多,一定范围内干扰了人才的选拔和发展,成为社会问题,亟需整治。

教育部考试中心刘建达教授指出,国家将加强教育考试机构、国家题库和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创建国家外语能力量表,以统一理念指导各级教学,体现发展性、多元性和实用性,以有效发挥测试的反拨作用,和课程标准相呼应,形成联动机制,促进科学选材和教育公平,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目前首先研制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将实现“车同轨,量同衡”,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教学都有评测参照,学习不重复,不断线,做到一条龙,形成有机的整体。确定外语考试质量系列标准,将确保信度和效度,体现公平。此外,还将改革、完善和整合各类外语考试,改变各类外语考试各自为政、互不关联的局面,听说读写并行协调发展,并借鉴国外形成性评估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武尊民教授报告了“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与改进提升”项目的进展情况,介绍了某区域的八年级英语学业成绩调查与评价情况。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中小学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构建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体系,实现诊断和监测两个功能。基于调查形成的大数据,反映各区域的学业成绩、课外活动等情况,形成教学评价,对命题、课标形成反馈,对改进教学方法有所启示。

4.6 其他问题

4.6.1 外语培训机构与学校正规外语教育的关系问题

王俊菊教授认为,外语培训机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干扰和抵消了学校正规外语教育的成效,应建立准入门槛。杨治中教授认为,要使学生认识到英语学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戒除急功近利、浮躁、贪图捷径的错误认识,正确认识培训机构的作用。常俊跃教授认为,应加强对外语社会培训机构和培训方法的研究。

4.6.2 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英语与其他语种的关系问题

王守仁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也面向英语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应思考如何创造条件促进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和谐、协调发展,满足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对外交流需要。文秋芳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对有关小语种的外语人才提出了新的需求。刘道义编审指出,中学小语种教学存在严重问题,急需采取措施,加强外语学校小语种研究,明确小语种的政策和教学目标,解决多语种师资问题。常俊跃教授基于 CNKI 的统计数据指出,英语和其他语种的研究严重不均衡。

5. 结语

会议主持者北京师范大学程晓堂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教授倡议,今后的论坛应聚焦某一教育阶段,深入开展研究,形成有事实、有数据、有观点的政策咨询报告,外语界应当在外语教育改革进程中“发出声音”。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关乎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需要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职能部门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外语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对有关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实证研究,引导社会各界准确评价外语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帮助细化和完善相关改革方案,使中国外语教育改革以理性和科学的方式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 [1] 杨春雪. 专家为中国外语教育改革把脉[OL], 新华网 2014 年 11 月 23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4-11/23/c_1113364253.htm)。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YY011)、2013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KB15913D)、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QJTD14TYS01)。